

浙江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世纪文潮学术书系

中国现当代 小说 点击



范家进◎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浙江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世纪文潮学术书系

中国现当代小说点击

Zhongguo Xiandangdai
XIAOSHUO DIANJI

范家进◎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小说点击/范家进主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39-2657-0

I. 中… II. 范…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②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008 号

中国现当代小说点击

著 者 范家进

责任编辑 胡 晋

责任校对 李惠琴

版式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295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57-0/I·1224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 言

毫无疑问，每一个初通文墨的人、每一个当代大学生都拥有读小说的经历，在所有断文识字的人当中，从来不看任何小说的人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即使有的话想必也是微乎其微。而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阅读各式各样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今的、通俗的、严肃的小说，则是我们日常读书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读小说是几乎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经历，那么，怎样阅读才能使我们从这份经历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呢？

也许一听到“收益”两字，有些读者会马上抗议说：不，我读小说纯粹是为了轻松和消遣，为了好玩，从来不考虑什么收益不收益。读小说还考虑什么教益，那未免太累了，还不如找别的东西来消遣。——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尤其对于一个从事文学以外其他工作的人而言，纯粹为着一时的兴致、为着消遣或好玩、为着打发一段比较空闲的时间而读小说，应该说是完全允许的，尽管从广义上说，消遣、好玩、打发一段时



间，其实也可以算是各种人生“收益”中的一种。不过，我们在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来读小说、讲小说，显然就不能停留在消遣或好玩的层面上（当然也不是完全排斥这方面的需要），而是必须把这种阅读尽可能多地纳入我们的日常求知轨道。毕竟，寻求各种知识、理性、真理、美感等等，是社会给大学教育所规定的最基本的使命。而对于一个人文专业的大学生而言，不断增加、扩充、改进、更新和探寻关于社会、文化、历史、自我、审美等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我们对于诗意的感悟和捕捉能力，尽可能多地获得对环绕我们周围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判断与应对能力，当然是我们最基本的日常求知任务。

那么，对于这里我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小说，我们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求知积极性，在这社会与文化都日新月异的年代，努力从对它们的阅读、分析与领悟中来建立一个新的求知平台，以便更好地健全和深化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质疑和审视已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进而提高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和社会的感应、认知与批判能力呢？

从世界范围内看，小说的形式确实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以至环境虚化、人物退居次要地位的另类小说也不难发现，但就总体情形而言，人物与其生存环境、主人公及其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小说家及其小说作品的关注与描写中心，——在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当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无论是“五四”时期小说家的重在揭示社会病苦、或大胆张扬主人公的个性需要，还是 30 年代的沉痛揭露阶级压迫的



真相、或真诚抒发对逝去的美好乡村生活的怀念，也无论是40年代作家忧世伤生地调侃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或义愤填膺地揭示下层民众带着一身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困兽般的挣扎，还是50年代小说家的尽情讴歌新时代里社会主义新人的茁壮成长、或勇敢地干预新体制中初步呈现的各种病菌和阴暗，更不用说80年代作家的高举人道主义旗帜重新宣告人的尊严和价值、或是90年代作家以各种崭新的叙事手法对普通中国人各种世俗生存状态的叙说与讲述……，在有影响的小说作品里，各式小说主人公在各种生存境遇下的艰难挣扎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各式悲欢离合、生死沉浮，仍然是小说家们设置情节、演绎故事及施展各种艺术想象的聚焦点或中心环节。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当代中国的小说读者也都无一例外地置身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同一社会文化境遇之下，也在或被动或主动地经历着不可避免的人生沉浮、个性成长与命运搏斗，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存在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因此，将“人及其命运”作为我们解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尽管表面上看去有点“落伍”，但按照小说创作与阅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既具有充分的文学史依据、又具有强大的现实推动力的小说阅读路径。

将“人物及其命运”确立为我们解读小说的切入点以后，那么，小说人物性格的丰满可信程度、人物之间关系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人物命运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最后的命运形态，便是我们首先所要考察的层面。或许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直都比较眷恋于人世，也或许是中国人将小说作为一种现代的虚构性文体的历史并不像西方那么长，因此，20世纪中国小



说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显得相当“入世”而无法超然、无法遗世独立飘然欲仙，体现在创作中则是每每在现实境遇中人的命运的触发与感召之下进入小说的构思和创作，就连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基人及短篇小说大师的鲁迅，也承认自己的小说往往有取自现实生活的模特儿或影子，尽管来源并不局限于某地或某处。不同类型的小说家们有的关注人的正向成长，详尽描写主人公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之后终于成长为英雄，成长为镶嵌着某种强烈意识形态光环的“新人”；有的则关注人的负向的沉沦，跟踪描绘主人公如何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命运的戏弄与打击最后终于沦为“非人”，成为一个性格受到极大扭曲的悲剧人物；也有的关注着新旧意识形态夹缝中的“中间人物”或是新旧体制交替下灰色而无力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通过“反典型、反英雄”的手法展示普通人俗世生存的艰难以及人之为人所必须经历的一些压抑与困难；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逐步浮出水面，一些女性作家则对当代女性所特有的感受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性格发展道路作了种种的倾诉与展示，以此表达小说家对于“男人另一半”的女人的性格与命运的种种思考与探索……。而从 20 世纪小说发展的总体轨迹上看，对人的表现与探索还逐步呈现出一种“向着内部、向着自身、向着深层自我”不断开发与掘进的迹象，从而与以“对人类生活的勘探”^①为最高宗旨的世界现代小说发展态势不断汇合与交流。

① 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见其《小说的艺术》第 24 页，三联书店 1992 年第 1 版。



当然，任何个人、任何形态的自我都无法离开他人、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对此，马克思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断言，海德格尔则以一句“人在世界中”来概括，小说家昆德拉则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形象地描绘成蜗牛与它的壳之间的关系^①，意味两者之间是如此的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以至于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将失去它们原来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此，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因为这一时期的总体社会文化特征可以说至今仍在动态地延续着并期待着多学科的进一步研究与解构，而站在不同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又迥然不同以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的立足点也只能谨慎地局限在小说家在他/她的作品中作了程度不同的描绘与表现的社会文化内涵，并且将紧扣着他们对主人公性格与命运所施加的不同影响来展开具体的描述与分析。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震荡与变迁是如此的剧烈繁复，以至任何真正成功的小说人物都不可能是单向度、单层面的，他们必然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经济变迁、文化转换及价值与心理的更新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个小说的读者被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所感动和吸引时，自然而然会对主人公所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予一份密切的关注，当发现人在环境面前有时是如此软弱乏力而又被动无奈时，也自然而然会情不自禁地质问一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① 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见其《小说的艺术》第34页，三联书店1992年第1版。



正是这一声质问，引出了我们解读小说的第二个重要层面：“人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究竟如何理解与阐释具体作品中主人公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所牵涉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批评家和读者的文艺理论知识，而是牵涉到如何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及其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变迁。在这方面，读者的知识谱系的更新显得尤其重要。倘若他只是谨守着从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上所得到的—般性常识或—般性知识框架来看问题，他就很难从作品中获得新的发现；而倘若勇敢地将自己投身到当今正在进行着的全球性知识文化更新的大语境中并且又毫不放松对自己所拥有的本土经验的认真审视与多方位的打量，那么，对于人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不断获得新的理论资源的援助，一些新的视野与方法可以质疑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一些边缘性、交叉性及综合性的学科知识，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及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知识，可以弥补我们旧的理论模式的局限与不足。如此来，小说的阅读将不再是一种因袭性封闭性的知识复制，也将不仅仅只是接受—点情绪的感染与情感的激动（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感染与激动是文学阅读之中必不可少的），而同时也可以当作是对读者旧的感受与认知方式的一次冲击及新的知识与理论视野的一次展望与寻求。在这样的小说阅读实践中，文本自身所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及阅读者本人的经验、感受和知识谱系的更新转型，都将呈现在一个动态开放的时空语境当中，从而使得小说阅读获得—种超越性的意义。

不过，既然是文学研究，我们的开放性超越性阅读最后还是必须回到文本和作家身上来。我们还有必要强调小说家观察

认识人、观察认识社会文化的独特视角，并进而考察与追究影响制约了这种观察认识的小说家自身的及外在的种种因素和力量，这便进入了我们阅读小说的第三个层面，即关于“小说家的独特视角及其成因”的层面，换言之，即关于作家为什么这么写的层面。无论社会如何急剧地变化，也无论文学理论如何的日新月异，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毕竟是作家的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在创作的全过程中都深深地刻印着无处不在的作家的个性精神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次创作就是作家个性的一次尽情展露，一部作品就是对作家知识与精神境界的全方位检阅，一次叙事或抒情就是作家与一个时代的知识精神状况的深层次多声部对话，显示出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或认同、或疏离、或抵抗或以上情况兼而有之的复杂关系。正因此，我们无法赞同“作者已死”的时髦文学理论，而是对作家的个人传记材料及个性精神予以相当的重视，认为从这里可以找到打开作品奥秘的最初钥匙，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个性纷呈、多元竞争获得了最初的保证。但“最初”当然并不意味着“最后”。作家作为一个精神劳动者，他/她的个性的健全的程度或者说其精神境界的深浅宽窄和高下，都深深地植根在他/她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总体知识精神状况及其外在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因此，我们在重视作家个人传记材料的同时，关注作家作品所产生的知识精神背景，关注制约作家作品的文学体制、文化体制以至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也应该适当地纳入我们的小说阅读实践当中（尽管要真正做好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一个小说家倘若只是接受了一个时代知识与精神的平均数，那么，他/她在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方面就不



可能有独到的发现；而倘若他/她的良知、精神与心灵生活都保持着勃勃生机，那么他/她对那些与他漠不相关的其他阶层人物的痛苦和不幸就不会置若罔闻，对身边无处不在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就不会无动于衷，对周围人物已经习焉不察的道德的粗鄙与精神的荒芜就不会熟视无睹以至麻木不仁。自然，作家的精神生活并不限于道德与心灵层面，他/她所拥有的知识谱系、理论视野、理性能力与思维方式等等，都同样会在他的小说作品里打下鲜明的印记。这就牵涉到小说家的“现代”观与现代意识、小说家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洞察力与认知程度、作家的全球化视野及其对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想象与选择等一系列比较重大的、远远超出本学科范畴的话题，倘若我们的知识条件许可，我们也将适当地展开一点展望和分析。这其实也正可以看作是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的当代读者自身的认知需要。当自幼伴随我们成长的各式教科书及越来越发达的大众传媒灌输给我们的一整套关于我们所处社会与文化境遇的现成知识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我们身边的现实社会及我们自己的现实人生体验之时，我们的内心生活如果还没有被完全窒息，那就不可能不渴望着一种更鲜活、更充实的知识状态以至更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精神存在方式。在这样的知识与精神恐慌当中，如果有一个眼光敏锐而又个性独具的小说家悄然出现在你的身边，以他所精心编织的情节与故事显示着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所特有的社会文化视野及独特的表现方式，这就有利于我们借助着小说家的观察来对流行的一般性知识与结论展开多方位的考察、审视与质疑，从而帮助我们读者摆脱单一机械的感受与思维方式，最终确立起我们自己开放坚实的社会文

化立场及灵活强健的个性自我。

说起读者的社会文化立场，我们不能不正视小说读者自身的特殊性问题。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强调的都是读者和人的特殊性。面对绵延百年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不同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读出自己不同的意味来。既然我们置身在一个远离都市文化中心和文学话语中心的小城，既然在座的诸位绝大多数都是从乡村和中小城镇走出的读书人，那么为什么要亦步亦趋地追随或挪用都市文学中心的视角，为什么不可以尝试着培育和发展起我们自己特有的边缘性小说阅读视角呢？我们知道，无论是清末的文化改良还是“五四”那场新文化运动，从发动与参与者的身份角度看，都可以称之为“贵族或准贵族的现代文化改造运动”。那个时代的文化领袖和启蒙英雄对自身的角色期待是相当精英化的^①，日常生活方式也与普通社会公众之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他们所开辟的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影响和制约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及文学氛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界文学界依然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广场英雄”心理以至“启蒙导师情结”。这种在知识界带有普遍性的知识英雄或文化精英心理不可能不影响到长期以来的小说阅读实践，人们往往乐于到小说中寻找英雄、讨论一个个主人公如何最终成为英雄，或是追踪与分析一个个作家如何在复杂纷纭的现

① 参见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见其《学者的人间情怀》第79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代政治斗争中成长为一个重要文化角色，以此象征性地实现评论者本人的英雄化自我期待。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大学教育的日趋大众化平民化，如果继续坚持这样的英雄化或准英雄化小说解读策略，将会使我们在各式小说作品面前处处碰壁、所获甚微以至一无所获，——对于置身在地方性边缘性社会文化境遇中的我们来说则更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边缘性和特殊性？什么是我们的独特小说解读视角？在上面说到的小说解读诸层面中我们将凸显哪些因素？显然这是个有待培育和发展的小说阅读策略和崭新批评空间，但这里也不妨尝试提出我们的基本追求目标和初步的关注视野。简言之，站在这样的地方社会面对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最适宜施展的是一种“平民化的小说解读策略”，换言之，也可以说成是如何将我们的小说阅读与这个时代的个体及群体的现代启蒙、或者说是“普通人的现代精神更新”结合起来，如何让小说阅读有利于置身地方性、平民性境遇中的文学读者发展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及审美认知，培养我们的现代个性，从而更清醒、更自觉地投入当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这样，势必带来小说阅读侧重点的不同选择。比如在人物方面，我们在注意英雄化主人公的同时，对于平民主人公的生存境遇将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方面，我们还尤其关注平民境遇中的主人公在面对社会和文化的诸多压迫时如何摆脱各种困境为自己的个性发展争取到了基本的条件，或者如何最终被环境所征服，成为社会文化环境所需要的毫无个性与棱角的庸众以至奴才与打手；对于作家小说家，也将更多地挖掘他们的平民襟怀与视野，关注他们对城乡关系的理解与



描写，关注他们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底层理念和乡村现代化理念。……一句话，对于平民主人公及其生存境遇的理解与描绘、对于作家的底层情怀及现代平民立场的捕捉与清理，是我们在小说阅读中想要不时地加以突出与强调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对小说中一般读者所感兴趣的其他层面与意义给予有意的忽略和漠视。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尤其是正当种种现代或后现代的小说阐释理论层出不穷之时，我们的小说阅读方式一点都不时髦、半点都不先锋，显示出一种十足的边缘性甚至某种落伍性。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去读小说。原因何在？说来说去还是要归结到我们所立足的本土现实与边缘境遇。既然当今中国总体上还是处在“走进现代化”的阶段，就足以说明它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现代化之外，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比较遥远。从价值观念与知识谱系上说，尽管都市的少数文化先锋已在与世界性的思想新潮热情拥抱与对话，但更多的文化公众与社会公众却仍然处在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前现代”或“现代”的知识氛围中，要完成知识形态、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上的现代转换仍然有着相当艰难而漫长的道路要走。对于我们所特别关注的平民及平民背景的读书人阶层来说，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地方传统与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下，其价值观念的“现代”程度更值得怀疑。他们所急需的与其说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超越以及对后现代思潮的拥抱，还不如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传统中诸如人的解放、个性独立、平等自由、民

主、科学等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温习、体悟及重新强化和践履^①；与其说是尽快学会以崭新的西方思潮解读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还不如说是如何学会用尽可能真正现代的知识、价值与观念来审视、观照和解释自己的生存处境，以便尽早摆脱对自身处境的昏昧不明状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我们重新面对“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时，在思想分析与艺术分析的取舍上，我们将更多地侧重于思想文化上的分析；而就思想分析而言，尽管我们也将正视在崭新的理论视野下所呈现出的现代新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负面因素，但更多的是梳理、张扬与阐释其中的一些正面因子，并密切关注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所经历的阻遏、压抑、打击与变形，以此凸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革命的艰难与痛苦、坎坷与曲折。虽然对于要怎样的现代化，当今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至不同的知识群体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渴望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却是全民族大体都能认同的社会发展目标。而人的现代化显然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就全民范围而论，知识谱系与价值观念的现代更新还仅仅是个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把我们的小说阅读自觉地纳入到“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普通人的现代精神提升”这一系统工程中来？

我们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这样的阅读尝试。

^① 参见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收于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第31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第1版。



目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阿 Q 正传》：双重赤贫中的畸形反抗 / 001

第二章 《沉沦》：现代青年灵肉冲突的大胆袒露 / 023

第三章 《家》：青春的受困与突围 / 043

第四章 《边城》：田园梦幻的诱惑与惊扰 / 071

第五章 《理水》：混沌重围中的民族“脊梁” / 095

第六章 《倾城之恋》：动荡乱世中的苍凉情爱 / 115

第七章 《围城》：笑中带泪的解构与反讽 / 137

第八章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代中国的成长困惑与焦虑 / 163

第九章 《春回地暖》：乡村整合中的心理蜕变 / 185

第十章 《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无根一代的“原乡”梦 / 205

第十一章 《命若琴弦》：生命的困厄与过程的精彩 / 229

第十二章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底层的“幸福”与
平民的情怀 / 253

第十三章 《一地鸡毛》：俗世人生的反讽与重建 / 275



第十四章 《活着》：对苦难与温情的耐心倾听 / 299

第十五章 《长恨歌》：都市民间日常生活的诗意挖掘 / 321

第十六章 《我是农民》：乡村苦难的回眸与进一步逼视 / 345

附录 / 367

《人生》：一声社会改革的深情疾呼 / 369

《憩园》：冰山上的旧梦 / 393

《浮躁》：“前现代”的生活与“后现代”的技巧 / 405

《风波》：掠过树梢的轻风 / 418

参考书目 / 431

后记 / 436